



初探心靈環保與永續發展： 永續躍遷視角之分析

黃信勳*

摘 要

永續發展是當今最流行的關鍵字之一，不僅在政策論述與科學研究領域擁有極高的能見度，也在企業經營、社會運動、報章媒體，乃至於日常言談時有所聞。然而，永續發展的流行性似乎未能等比例地反應在其行踐成效上，存在著實踐赤字的問題，永續躍遷即以此為其研究旨趣，直接應對「體制」（regimes）的多重深層轉型挑戰。本文尋繹聖嚴法師所提倡的「心靈環保」之精神內涵，認同其「應用佛法」的「實踐」取徑，具有引導社會文化價值變革的轉型力量，故而透過永續躍遷研究與心靈環保之間的對話，反思永續發展之實踐課題，以期深化永續發展之討論與行踐之道。

關鍵詞：心靈環保、永續發展、永續躍遷、轉型三重圈

*黃信勳，法鼓文理學院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23.1.12；接受日期：2023.7.11

“Spiritual Environmental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Perspective o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Hsin-Hsun Huang*

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cussed concepts of recent times. This term, or even buzzword, appears in a range of contexts, such as academia, public policy, business, social movement and mass media. However, implementation deficits have meant that little re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wards a genuinely sustainable future.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transformations required to overcome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studies focuses on regim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iritual Environmentalism” promoted by Master Sheng-Yen, and argues that it could facilitate the kinds of changes in social norms and values which are crucial factors i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This paper uses insights from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studies and “Spiritual Environmentalism” to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spiritual environmental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the three spheres of transformation

* Hsin-Hsun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Social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 M.A. Program,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Manuscript received: 2023.1.12; Accept: 2023.07.11

一、前言

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惟隨著工業革命以降，大量生產與消費的經濟模式、依賴化石燃料的現代化生活系統，以及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與廣泛應用，對自然環境帶來巨大的衝擊與壓力，其後果不但影響當代的生活品質至鉅，甚且威脅到未來世代的福祉與存續，因而有「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論述之勃興與追求。尤其是在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以及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之後，該理念不僅成為最主流的環境論述，引領著環境運動、教育、規範、行政與治理等諸般環境行動，也幾乎成為世界共通的環境治理目標與原則，被廣泛地揭櫫於國際、國家與地方等不同層級的行政機關，以及各個層級內不同部門的政策之中。例如，聯合國自1992年開始舉辦10年一度的環境大會(United Nations, n.d.)，便皆以永續發展為核心，其中2002與2012年大會更直接以之為名；再如作為2016~2030年聯合國推動全球邁向共同未來的變革性行動計畫，就是植基於17項「永續發展目標」(United Nation, 2015b)；我國亦於1997年成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¹ 不一而足。

儘管永續發展在環境政治與政策領域中占據了主導性的位置，惟其成效則難謂顯著，陷於「永續落差」(sustainability gap) 的困境(Fischer et al., 2007)。例如，「千禧年發展目標」² 之總結報告指

¹ 永續會成立後完成的主要永續發展文件包括：2000年「21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2002年「永續發展行動計畫」；2003年「臺灣永續發展宣言」以及「永續發展指標系統」；2004年「臺灣21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2009年「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以及第2版「永續發展指標系統」；2018年「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² 於2000年通過的「千禧年發展目標」係為落實《聯合國千禧年宣言》(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而設，期以創建更和平、繁榮和公

出，雖然在貧窮、飢餓、健康、教育等議題有所進展，但挑戰依舊嚴峻，特別是性別不平等、貧富差距、「氣候變遷及環境劣化」等問題（United Nations, 2015a: 8）。另就旨在保護與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之《生物多樣性公約》以觀，生物多樣性雖是維繫地球生態系健全，以及確保人類存活與發展的基礎，檢視該公約2010~2020年之目標發現，20項目標沒有一項完全實現，僅有6項部分實現，部分子目標甚至更加惡化（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0）。換言之，永續發展在執行成效上，存在著「實踐赤字」（implementation deficits）（Seghezzo, 2009: 547）之問題，整體人類社會朝永續轉型呈現牛步化之況，後乃有以尋求實踐解方為旨趣的「永續躍遷研究」（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studies）之興起（Brauch et al., 2016; Gliedt & Larson, 2018; Grin et al., 2010）。

永續或不永續是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結果，永續性則是一種可欲的「社會—生態系統」（desirabl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狀態（Uehara et al., 2019），對於永續發展的追求意味著人類社群與自然環境，需要新的互動秩序。永續躍遷研究指出，永續問題之所以頑強難解（persistent），除了該等問題之「複雜、不確定與衝突」特質，更係支配性實踐與結構之「路徑依賴」所致，解決之道有賴於結構性與長期的改變（Avelino et al., 2016: 557; Gliedt & Larson, 2018: 9; Grin et al., 2010: 1）。質言之，永續躍遷涉及社會發展的劇烈轉向，並伴隨著國家、市場、社會與科技及其彼等之間相互關係的根本性轉型（Grin et al., 2010: 320）。對於此等具連鎖互動特性的深層結構轉型課題，探尋得以翻轉複雜系統的槓桿點或介入處（places to intervene）便相當重要（Fischer & Riechers, 2019; Meadows, 1999）。相應於此，聖嚴法師（2004a: 23, 59）提倡「心靈環保」，強調環境保護須得「從人心的

正的世界，內文指出邁向21世紀應抱持的基本價值有六：自由、平等、團結、容忍、尊重自然、共同承擔責任。

淨化做起」，除了力行「簡樸」的生活原則，更要建立「少欲知足、關懷他人」的價值觀，被認為具有形塑深層生態學所強調之「生態大我」認知的潛能（楊惠南，2005：xii）。此等主張無異於「規則、目標、典範」等深層槓桿點（deep leverages）之說（Abson et al., 2017: 33），值得深掘其翻轉現行系統或體制的潛能。

基於對永續發展之「實踐赤字」問題，以及永續躍遷之深層結構轉型困境的認識，本文擬探索聖嚴法師所提倡的「心靈環保」，借鏡其「應用佛法」（趙敬邦，2011）的「實踐」取徑，反思永續發展之實踐課題，期能貢獻於永續發展之討論與行踐之道。在方法上，以文獻探討為主軸，透過分析與詮釋聖嚴法師之著作及其相關研究文獻，尋繹「心靈環保」的洞見與啟示，填補轉型至永續社會過程的知行差距。後續行文安排如下：接續前言之後，第二節從「社會—生態系統」研究取徑闡釋「永續躍遷」之「系統變遷」（systemic change）特質，並引介「轉型三重圈」（the three spheres of transformation）之分析框架，指出親永續的文化價值觀之於建構永續社會的槓桿作用。第三節從聖嚴法師提倡的「人間淨土」掌握「心靈環保」，透過脈絡化的分析理路澄清「心靈環保」的環境保護路線。第四節進而從「心靈環保」之全面性關懷出發，剖析「心靈環保」的環境論述，說明其重塑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意義。第五節以當代農糧體制為例，析論心靈環保與永續實踐之親和性及其對於突破轉型困境的作用。最後指出，心靈環保運動就是永續型「新倫理生活方案」之「集體學習」的渠道與體現，具有轉化整體社會文化價值觀，重構「發展」內涵，開啟永續躍遷機會之窗的潛力。

二、永續躍遷：永續發展是轉型性變遷

《我們共同的未來》對永續發展之定義係最常被採用者，亦即「滿足當代需要而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能力的發展」（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1987: 8)，其實踐之指引在於調和經濟與社會系統以及生態條件，因為一個真正永續的社會必須將社會需要和福祉，以及經濟機會等更廣泛的問題，與環境關懷整體性的連接起來，不能僅聚焦於環境面向（Agyeman et al., 2003: 2）。例如，2012年聯合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的總結文件《我們要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便高揭兼及滿足環境、社會與經濟之論。³然而，《我們共同的未來》將「貧窮」界定為「全球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和後果」（WCED, 1987: xii, 3），「發展」自然成為對治貧窮與環境問題的不二良方，加上對於改善「技術與社會組織」得以化解「限制」的樂觀，永續發展也被視為調和工業化經濟發展與環境破壞及資源耗竭問題之出路，該報告爰以「經濟成長的新時代」作為因應永續挑戰的總綱領（WCED, 1987: 43, xii）。此等「雙／多贏」之說，往往讓人誤以為永續發展可以在毋須面對深層變革及困難抉擇的狀況下簡單達至，這也部分說明永續發展牛步化之「實踐赤字」的理由。

（一）系統變遷

作為生命支持系統的自然環境，是人類能否存續與繁榮的基礎，但層出不窮的環境問題卻是人類始終未能有效處理的嚴峻挑戰。例如，臺灣自上個世紀70年代起展開的諸般環境作為，雖有部分成果，惟整體而言，呈現的是環境改善與惡化並立的混雜景況（黃信勳、徐世榮，2014），環境挑戰依舊頑強難解，特別是全球氣候變遷引起的諸般轉型困境。易言之，環境問題具有「涉及面廣、扣連度深、常有牽一髮動

³ 《我們要的未來》強調「整合經濟、社會與環境等三個面向及其連結（interlinkages）」的重要性，並指出實現永續發展有賴於「促進永續、包容和公平的『經濟成長』，為所有的人創造更大的機會，降低分配不均並提高基本生活水準；增進公平的『社會發展與包容』；以及強化『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統的整合性和永續性管理』，藉以支持經濟、社會和人類發展，同時裨益生態系統的保育、再生、修復及韌性」（United Nations, 2012: 1）。

全社會的情形、也有比較高的風險機率而引發不可逆轉的災難」之特性，是典型的「頑強問題」（張國暉，2019：238）。面對頑強難解的環境挑戰，歐洲環境署檢討指出，過往以「線性因果原則處理個別議題」的觀點有所不足，須得由「系統的」（systemic）觀點來加以掌握（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 2018: 7, 6），因為環境挑戰與科技、經濟、社會文化和制度等社會次系統以複雜的樣態（complex）緊密交織。環境問題因此並非單純的不可欲的生物物理現象，不能只處理環境介質或市場失靈之類的單一面向，而是要解決一系列相互扣連的問題（interconnected problems）（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5: 9）。

所謂的「系統」意指由一系列相互依賴與關聯的部分，彼此有序組成的複合整體，其內存在層級或尺度關係（scale）、調適（adaptation）以及反饋迴路（feedback）等特性（Meadows, 2016），當中最明顯的特質便是彼此連動。由於永續或不永續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結果，從系統觀點出發的「社會—生態系統」研究取徑，強調人類社會鑲嵌於（embedded）自然環境，兩者彼此相互形塑，以一種更為整體性的視角來認識環境問題，為回應永續挑戰提供諸多洞見（Bruckmeier, 2016; Ostrom, 2009; Reyers et al., 2018）。例如，「社會—生態系統」之研究特別關注如何避免社會運作跨越生態系統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s）或地球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及其衍生的崩潰與不可逆之環境變遷的風險，從而讓人類能夠生活在環境高限（environmental ceiling）與社會底線（social foundations）之間的安全公正空間（a safe and just space）之內（Raworth, 2012）。要之，「社會—生態系統」是一個連貫的協調系統（a coherent system），人與自然環境於此系統內相互連結（interconnections）、交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ies），存在著動態關聯性（dynamic relationships），兩者共構成為一個耦合系統（a coupled system），有別於傳統二元論

(O'Brien & Sygna, 2018: 28)。

如前所述，環境問題源於自然環境與科技、經濟、社會文化和制度等社會次系統彼此交互作用的結果，朝向永續社會轉型需要經濟、社會文化、制度與科技的變革，因為後者彼此強化，必須系統性看待與應對。爰此，對治永續挑戰與頑強環境問題之解方繫於掌握複雜系統的特性與動力學，⁴ 進而推動系統變遷 (systemic changes) 方足以致之 (Brauch et al., 2016; EEA, 2018; Köhler et al., 2019; Lachman, 2013; Loorbach et al., 2017)。事實上，這也就是永續躍遷研究的共同核心關懷，⁵ 亦即如何引領人類社會朝向一個永續未來的基進轉型 (radical transformation)，以資回應當代社會所遭遇的諸般頑強難解問題 (Grin et al., 2010: 1)。正因為永續躍遷涉及社會發展的劇烈轉向，並伴隨著國家、市場、社會文化與科技及其彼等之間相互關係的根本性轉型 (Grin et al., 2010: 320)，本文爰將“transition”譯為「躍遷」，凸顯其間的斷裂與思想躍進 (leap)，帶有典範移轉 (paradigm shift) 之意，異於主流永續發展的「雙／多贏」之說。

(二) 永續躍遷：體制的根本改變

於系統觀點下，躍遷意指從一個系統狀態 (system state) 遞移至另一個系統狀態，其間所經歷的是一個非線性的顛覆式變革 (nonlinear

⁴ 複雜系統的特性與動力學 (the properties and dynamics of complex systems) 略為：共同演育 (Co-evolution)、複雜 (Complexity)、突現 (Emergence)、不確性定 (Uncertainties)、鎖定 (Lock-ins)、非線性 (Non-linearities)、反饋 (Feedbacks)、交易權衡 (Trade-offs) (EEA, 2018: 20)。

⁵ 永續躍遷研究因學術領域與理論背景之別而有不同的探究進路 (approaches)，由系統論開展的主要概念框架有四：社會—生態系統、社會—科技系統、社會—制度系統，以及社會—經濟系統 (EEA, 2018; Loorbach et al., 2017)。

disruptive change) 過程。此等系統變遷是發生在不同層次與領域的各種改變，彼此交互作用 (display) 而對系統所產生的根本性質變 (fundamental qualitative change) 之結果 (Loorbach et al., 2017: 605)。基於不同的人類——生態互動類型帶來殊異結果之認識，永續躍遷在社會——生態系統的脈絡中意味著，透過社會系統的轉型變革以支撐生態系統穩定與／或提昇其應對衝擊干擾之能力 (Loorbach et al., 2017: 612; Reyers et al., 2018)。此間所涉及的係，改變「結構與制度、基礎設施、管制系統與金融體制、態度與實作、生活風格、政策與權力關係」等構成社會系統之基本特質 (Hackman & St. Clair, 2012: 16)。該等基本特質於轉型研究中，被統稱為「體制」(regimes)，也是斷裂性系統變遷發生的所在 (Avelino et al., 2016; Geels et al., 2017; Gliedt & Larson, 2018; Grin, 2016; Lachman, 2013)。簡言之，體制代表的是社會(次)系統的主導性秩序，或穩定的組構安排配置 (configuration) (Loorbach et al., 2017: 605)，從而也是造成不永續現況的成因，以及被轉型的目標對象。當既有體制被更具永續性的新體制所取代也就是轉型的達臻，稱之為「體制遞移」(regime shift) (Kemp et al., 1998)，至此階段，基礎設施、政策、生活方式與常態觀點 (views on normality) 都將調整至服膺永續原則的新樣態 (Geels, 2018: 225)。

雖然永續發展或永續性具有論述上的正當性與主流地位，但永續躍遷的「斷裂性」提醒我們，對社會整體而言，它不會自動成為絕對可欲的有益選擇或發展路線，因為系統變遷意味著挑戰現行「投資、工作、行為、知識與價值」的常軌 (EEA, 2018: 22)，帶來輸贏兩方，是一個「建立與瓦解」的迭代過程 (Loorbach et al., 2017: 607)，故而必然遭致抗拒。此外，系統是由部分組構所成，而個別部分之間的互依連鎖以及共同演育 (co-evolve) 特性衍生出怠於改變的惰性 (sluggishness) (EEA, 2018: 10)。易言之，系統具有續行的慣性，抗拒改變或急遽變革，若未能正視該等系統特性，僅著眼於最適化 (optimization)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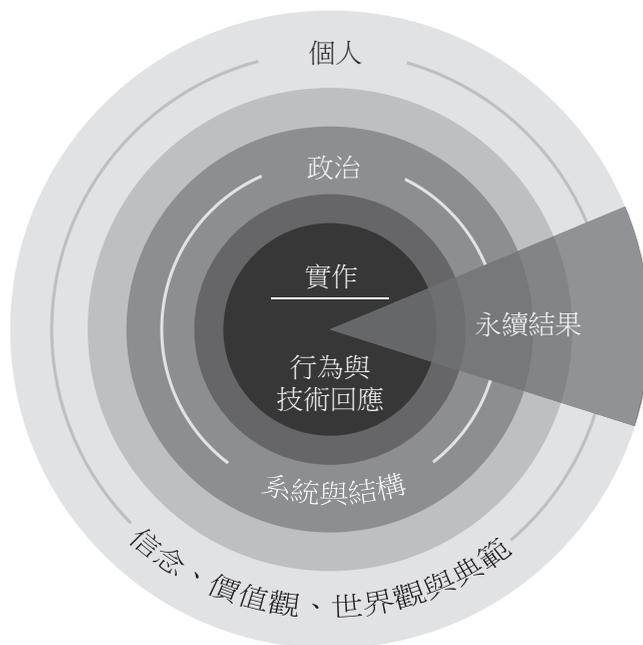
永續發展政策或方案，反而擴大加深社會系統的鎖定作用（lock-in）。例如，囿限於價值競爭力的市場效率觀點，無異於排斥環境友善的有機農產品與再生能源科技，導致慣行農業與傳統化石燃料能源體制持續占據主導性地位。綜之，從不永續的體制鎖定朝向永續發展轉軌（conversion）係轉型性變遷的過程（transformational change）（Reyers et al., 2018: 276），威脅現行體制與既得利益，所以系統變遷的動量（momentum）需要培育建立（Loorbach et al., 2017: 602），永續躍遷方能成就。

（三）轉型三重圈

「社會—生態系統」的轉型是複雜、不確定與突現（emergent）的共同演育過程，涉及不同層級尺度的行動與變遷，充滿變異性（EEA, 2018: 9），無法以事先規劃藍圖而後逐步實施的模式予以操作，永續躍遷研究的重點即在於指出可能的轉型機制或機會所在。不同的永續躍遷研究取徑雖有各自的著墨重點，「創新」（innovation）與「廣泛的社會參與」（broader societal engagement）愈來愈受關注（EEA, 2018: 25），因為前者代表的是「替代方案」，而後者則是「實踐力」，兩者同為系統變革不可或缺的兩大元素。創新是試驗與做中學的結果，提供社會常軌運作外的其他選擇，能夠觸發、啟動與加速轉型。創新的形式不限於科技、制度或治理，晚近更擴及倡議、商業模式、網絡組織之類的「社會創新」。例如，模塑「集體層次的替代性價值觀與觀念」、創造「社會生態生活風格」等，皆被視為轉型試驗（Loorbach et al., 2017: 608）。由於永續躍遷是規範性（normative）的設定，其具體的願景與目標往往隨社會脈絡而異，如何形成每個人對於「我們共同的未來」都是利害關係人的認知，擴大集體參與及許諾，方能強化變革的社會接受度及其社會實踐力，而「認知、道德、美學和藝術、情感、價值」等主觀面向之模塑被認為有助於集體參與（O'Brien & Sygna, 2018: 43）。

系統變遷是一個「政治過程」，兼具「質變與量變」兩個面向，且擁有不可預見結果之「突現」特性（Avelino et al., 2016; Loorbach et al., 2017; Meadows, 2016）。基於此等認識，O'Brien與Sygna（2013, 2018）將「社會—生態系統」轉型總括性地界定為「形式、結構與意義建構的物理與／或性質變化」，並提出轉型三重圈（three spheres of transformation）的分析架構（詳圖1），以涵蓋形式、結構與意義建構等不同層次的變革。三重圈包含了「實作、政治與個人」三個範疇，轉型就發生在這三個套嵌而相互影響的範疇內，一方面凸顯有多元的介入點以獲致永續結果，他方面也強調「社會—生態變遷」之主客觀面向間的交互作用（O'Brien & Sygna, 2013: 18, 2018: 35）。

圖1
轉型三重圈



資料來源：O'Brien與Sygna（2013: 18）。

實作圈 (the practical sphere) 位處核心，是目標與永續成效被觀察到的地方，代表各種行動與介入或技術解，例如，提昇知識與專業技術、促進創新、改革經營管理以及改變行為。多數永續性倡議（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皆聚焦於此，惟其成敗往往取決於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之系統和結構，亦即包圍著實作圈的政治圈 (the political sphere)，因為該等系統和結構影響甚至決定了實踐或改變的條件。政治圈是討論、協商、決定或施行種種決議、規定、標準、規則、協議、誘因及優先次序的所在，為社會運作或個人行為提供行踐的環境，代表著授能或禁絕 (enabling/disabling) 的條件。事實上，政治領域既是問題與解決方案被辨識與定義之所，同時也是利益衝突發生之地，以及替代方案透過新論述與典範而浮現之處 (Grin, 2016: 105)。政治圈中的規定、規則與制度又被社會與文化規範 (norms) 所模塑；新的規範甚至會對政治圈形成挑戰。該等規範源自一個社會中人們普遍持有的「價值觀、態度、信念、取向與基礎預設」 (Huntington, 2000: xv)，左右著政治領域內的行動或不行動。個人圈 (the personal sphere) 觀照的是轉型的主觀面向，也就是與社會文化規範高度相關之個人的和共享的「信念、價值、世界觀與典範」，構成規範 (normative) 與認知 (cognitive) 意義上的常規 (Geels & Schot, 2007: 403)，影響著人們如何理解周遭世界以及如何與之互動的觀點，進而形塑系統與結構（即政治圈）如何被看待、影響解方（如實作圈內的行動）合宜與否之判斷 (Christmann et al., 2014)。個人圈的轉變因此是非常有力的，它不僅能重塑系統目標，也可藉由社會與文化的再建構來改變影響「社會一生態系統」之規則、規範與行為。

循轉型三重圈之論可知，雖然存在不同的轉型切入點，但心態思維 (mindset) 或世界觀被認為是轉變不永續之「社會一生態系統」的關鍵因素 (O'Brien & Sygna, 2018: 39)，因為它們能夠開啟如何理解

人與自然之關係聯結的新視角。例如，肯認「關係價值」⁶（relational values）可以更全面理解自然價值，從而引發友善環境行為（Chan et al., 2016; Mattijssen et al., 2020; Pascual et al., 2017; Stålhammar & Thorén, 2019; West et al., 2020）。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價值（觀）可能會在特定脈絡中被賦予優先性，且人地關係變遷隱含的世界觀轉型多屬經驗性，較少來自智識論辯說服（O'Brien & Sygna, 2018: 37），「社會—生態系統」之研究取徑因此主張地方行動係改變根深柢固之社會價值與世界觀的樞紐（EEA, 2018: 21），強調在情境特定的地方脈絡中，創造讓轉型性變遷得以蓬勃開展的「條件」而非透過調控（O'Brien & Sygna, 2018: 39）。綜上所述，形塑社會文化規範之價值觀與世界觀可視為翻轉不永續「社會—生態系統」之系統槓桿點（leverages points in system）（Meadows, 1999）。至於親永續的社會文化該如何形成或主流化，則可從聖嚴法師倡議推動的「心靈環保」運動獲得啟示。

三、建設人間淨土總綱的心靈環保

根據聖嚴法師自述，「心靈環保」是一個有佛法基礎的新創詞彙，其緣起是眼見當時臺灣「環保觀念才剛起步，許多人對於環保意識，尚很模糊」，為求正本清源，故而倡議「改造環境，首先在於改造自心」的心靈環保運動，主張環保意識從「心」開始，環保工作要從「心靈」做起（聖嚴法師，2004a：4，57，58，72）。由此可見，心靈環保與臺灣的環境保護風潮密切相關。雖然心靈環保是一種獨特的環境論述（林益仁，2004），其意涵與應用卻不限於環境保護而有多樣的闡釋與

⁶ 從環境倫理之研究而論，自然具有三重價值：內在價值、工具價值與關係價值。關係價值源自關係聯結（relationships）的偏好、原則與美德（或善），該等偏好、原則與美德既存在於人際間，也被政策與社會規範所強調（Chan et al., 2016: 1462），而該等關係連結有益於形成「人類與自然之間」以及「透過自然而在人類之間」的理想關係（Pascual et al., 2017）。

實踐。聖嚴法師便直言，心靈環保的「內容是極其寬廣的」（聖嚴法師，2005a：60），並以「多元的內涵、觀念與方法」進行開示（法鼓文化編輯部，2012：4），各方對於心靈環保的理解因此並不一致，特別是「環保」的面向，追隨者雖眾（朱建民，2007；江靜儀，2018；紀俊吉，2014；胡健財，2014；程進發，2014；蕭貞貞，2011），批評質疑者亦非鮮見（林益仁，2004；林朝成，2005；梁容，2014；楊惠南，1996，2005）。此外，「心靈環保」是建設「人間淨土」的主軸，「人間淨土」思想承繼自「人間佛教」，兩者緊密相關（聖嚴法師，2005b，2018），要理解心靈環保，便不能不對人間佛教有所認識。爰此，本節從復興佛教的宗教關懷，以及時代潮流的社會關懷此二視角，探索法師提倡心靈環保的思考理路，從而指出心靈環保實係從「心」出發的另類環境保護路線。

（一）人間淨土：復興佛教的發展路線

佛教的終極目標是破迷開悟，眾生解脫，身為當代佛教重要宗教家的聖嚴法師為何會高揭「環保」？法師投注心力的事務雖多，其重心則為「佛教生命之開展與延續」，如何讓佛教「常住、新生」之課題（林其賢，2010：169）。基於對佛教流於玄虛鬼神卻與現世疏離之認識，聖嚴法師上承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對比度亡佛教），以及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對比山林佛教）之改革路線，⁷擇定了「人間淨土」的根本立場（林其賢，2011）。該立場反映的實乃聖嚴法師對「成熟眾生，莊嚴國土」此一佛教共同目標的認識與追尋（聖嚴法師，

⁷ 按林其賢（2011：159）的研究，「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都是太虛大師首先提出；但在使用上，太虛大師偏重「人生佛教」，印順法師則對「人間佛教」有更豐富的開展。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是用「生」來區分「死」，用「人」來區分「鬼神」；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則是在人生佛教的基礎上再進一步用「人間」來區分密宗的重視天道、淨土宗的重視他方、禪宗的重視山林（林其賢，2010：160）。

2020b：239）。法師於1989年創建法鼓山，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之理念，作為法鼓山的共識與方向（聖嚴法師，1999：81），便是對人間佛教的「全面推動與普遍落實」（聖嚴法師，2003：10）。

人間佛教強調，佛在人間成佛，佛陀教化的環境主要是在人間，一切眾生皆可成佛（聖嚴法師，2005b：447），其核心關懷在於如何使佛法成為「適應時代，有益人類身心的，人類為本」的佛法（印順法師，1989：4）。按林其賢（2011：161）的研究，人間佛教的論旨為：「人材凋零」是現代佛教的主要問題，當中的癥結在於「佛法與人生脫節」，因此解題主軸繫於「立足於人間，將佛法與人間的關聯充分展現」，而解決方案則是「將佛法與人世間各層面各向度充分結合」。人間佛教因此可以理解為當代所需要的佛教，藉以翻轉佛教與現世人生疏離的走向，避免因為與社會疏離而邊緣化。爰此，「人生佛教」帶出的「人成佛即成」觀點，以及「人間佛教」強調「凡夫學菩薩行」的主張，乃至於「人間淨土」對「淨化人心社會」的關注（林其賢，2011：170，176；聖嚴法師，2004a：59），皆係肯定「人間性」的價值（聖嚴法師，2005b：447），共同體現「佛在人間」的核心思想（林其賢，2011：197），讓社會大眾重新認識佛法之於現世人生的價值與重要性。也因為如此，聖嚴法師特別「重視實用，重視和現代社會結合、接軌」（果東法師，2010：4），社會參與深廣。

人間佛教強調「立足於人間」，讓社會大眾重新認識佛法於發達此生此世的積極作用，尋覓介接佛法與社會的渠道，重啟佛教與社會的對話、互動，便顯得非常重要。回顧戰後臺灣的社會運動可知，⁸ 1980年

⁸ 社會運動涵蓋議題極廣，除了環境運動之外，另有：勞工運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教師人權運動、教育改革運動、客家運動、無住屋者運動、學生運動、政治人權運動等（何明修、蕭新煌，2006：79-105）。

代是臺灣社會力興起、環境運動勃發的時期，其中又以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的影響層面最廣（何明修，2006；何明修、蕭新煌，2006）。雖然環保抗爭的壓力促使社會與政府更加正視臺灣的環境問題，有其不容忽視的重要貢獻，但對仍習於戒嚴時期「安定」表象的臺灣民眾而言，不免有社會浮動的不安之感。此等社會變遷與環境劣化的時代脈絡，正是聖嚴法師提出「心靈環保」的背景緣由：

一九九三年我曾提出「心靈環保」這個名詞。當時因為社會脫序，出現了許多的亂象，而環保人士一連串抗爭的結果，非但未能改善環境，反而使得環境更形惡化。因此我就提倡了「心靈環保」的運動，我深切地感受到，人心如果不能淨化，社會也就不可能得到淨化；人的內在心理環境若不保護，社會的自然環境也沒有辦法獲得適當的保護。（聖嚴法師，2005c：9）

至於為何選擇環境議題而非其他社會議題？一方面是由於「環保」觀念在1990年代已廣受臺灣社會接受，佛教界也開始參與對環保的詮釋和實踐，進入門檻最低（林益仁，2004：21；楊惠南，2005：258）。例如，法師便曾提及：「現在『最流行』⁹的就是環保，其實佛教原來就是講環保，我們講的是『心靈環保』」（聖嚴法師，2019a：121）。它方面則是因為珍惜資源和減少垃圾之類的環保行動與佛教「福報」觀點相近，倡議環保毫不違和。例如，「寺院本來就應過著簡樸的生活，和今日提倡環保的大趨勢無關，只是『此時』兩者互相呼應而已」，故而「『響應』環境衛生、保育自然生態、珍惜自然資源的『號召』」，推動環保運動是極其自然的（聖嚴法師，2004a：23，3）。

聖嚴法師（2004a：3）秉持佛教「積極入世」的發展理路，從1989年起提倡「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響應當時「環境衛生、保育自然生

⁹ 雙引號為作者所加，下文皆同。

態、珍惜自然資源」的號召，並發起「心靈環保」的運動，獲得廣泛的迴響，法師因此有「環保和尚」之譽（林益仁，2004：22）。就「佛教薪火承傳」之目的而言（果東法師，2010：4），「心靈環保」與「人間淨土」之類的環保論述更發揮著，轉化佛教徒對「來世彼岸」的嚮往成為對「現世此岸」的社會關懷，重鏈佛法與現世人生，體現人間佛教以人類為本的思想精神，也讓佛法脈絡中的「人間淨土」概念增添了自然環境的元素。

（二）心靈環保：從「心」出發的另類環境保護路線

聖嚴法師（2020b：239）曾總結性的提及：「建設人間淨土必須先提倡心靈環保，而心靈環保就是成熟眾生，莊嚴國土」，亦即，落實心靈環保是人間淨土得以成就的關鍵方法與途徑，人間淨土則是心靈環保所欲達臻的現世社會理想，兩者是分不開的（林其賢，2010：175；胡健財，2014：273；梁容，2014：176）。所謂淨土，指的是佛、菩薩等聖人所住的「無病、無惱、無苦的環境」，其類型有四：唯心淨土、他方淨土、天國淨土與人間淨土（聖嚴法師，2003：22，23）。提倡人間淨土並未否定他方佛國淨土的信仰，而是強調十方三世諸佛國土的成就與往生，必須從「人間的立場做起」，在世時即經營「自利利他的福業」，累積資糧（聖嚴法師，2005b：447，460）。質言之，「人間淨土」的實意應是「修淨土」，若用較無宗教色彩的話來講，就是「建設淨土」，其具體內涵則係：

眾生（人）的「心清淨」而「行為清淨」，個人的「身口意清淨」而影響所處的「社會環境清境」。在做往生佛國、嚴淨佛土的準備工夫階段，先要在人間「自利利人」，便是「建設人間淨土」。（聖嚴法師，2005b：447）

核其重點在於「淨化人心」，培養「自利利人」的價值觀，而此理

念亦可從法師對於發起心靈環保運動的說明窺見：

若想救世界，必須要從「救人心」做起，如果人的思想觀念不能淨化，要使得社會風氣淨化，是非常難的。「心靈的淨化」，便是理性與感性的調和，智慧與慈悲的配合，勇於放下自私的成見，勤於承擔責任及義務，奉獻出自己，成就給大眾，關懷社會，包容他人。唯有如此，「人間淨土」的實現，才不會僅是空洞的理想。
(聖嚴法師，2004a：3-4)

由此即不難發現，心靈環保有別於一般環保運動，強調「從人心的淨化做起」，有別於「物質環境的保護」之議（聖嚴法師，2004a：23）。之所以如此重視「心」，與其佛法根源有關，如同聖嚴法師所言，心靈環保雖是新創的名詞，

它的根源，則是《維摩經》所說的「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華嚴經》說的「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華嚴經》又說「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滅時罪亦亡」。（聖嚴法師，2004a：4）

以上諸言論清楚地反應佛法為心法，心為根本的基本立場。

為了引導出具體環境行動，法師對環保實踐有著相當宗教性的詮釋，例如：「佛教講因果、講福報，唯有每個人少浪費、珍惜現有的資源，我們才能得到更多『福報』，走入人間『淨土』」、或「動物可能是發了菩薩心願的『未來佛』，對待動物應該就像關懷、尊敬所有未來的佛一樣」，乃至於「少丟棄一個塑膠袋就是一個『功德』」（聖嚴法師，2004a：66，68-69，35）。換言之，法師賦予「環保」在個人修行層面的宗教意義。他淡化了原本環保論述中濃厚的生態科學論理，代之以宗教性的用語，同時也大幅度去除一般環境運動中常見的社會政治批判言論，轉而讓環保成為「個人宗教修行的日常實踐」（林益仁，

2004：21-22）。

綜上所述，「人間淨土」與「心靈環保」具有內在同性，「環保」之語無異於「淨化」之說（聖嚴法師，2020a：169），對於淨化人心或心靈最為關鍵之論，係指從改變人的觀念、思想、價值觀出發（聖嚴法師，1999：526），故而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非謂個人的自心清淨則淨土自成，而是有賴於行為改變，層層外推擴大，方足以致之。誠如惠敏法師（1998：246，240）於〈「心淨則佛土淨」之考察〉文中指出，心淨與佛土淨之關係應為「心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佛土淨」，當中的關鍵在於「眾生淨」，而眾生淨則是來自「淨土之行」。「心淨一行淨一淨土」的關係式應予肯認。正因如此，建設人間淨土與心靈環保之外，更有四環、心五四與心六倫等具體行動面向與行為指導的規劃與實踐。此等努力可以理解為，大乘佛教「把『出世』的精神建立並落實在『入世』的實踐之上」（楊惠南，2005：273）。心靈環保爰可謂為從「心」出發的另類環境保護路線，透過詮釋佛法的中介，將環境價值內化為個人行事準則的一部分。

四、心靈環保的環境論述

心靈環保雖以環保為名，人間淨土也帶有永續發展的想像（江靜儀，2018），但不可諱言的，聖嚴法師主要是從佛教的角度來倡議與推廣，其關懷並不侷限於環境保護，而是廣及「世界人類的幸福和未來」（聖嚴法師，2011：17）。例如，法師在詮釋何謂現代人的心靈環保時說道：「以健康、快樂、平安的身心，照顧自己、照顧社會、照顧大自然，使得我、你、他人，都能健康、快樂、平安地生活在同一個環境之中，便是現代人的心靈環保」（聖嚴法師，2005a：41）。

足見心靈環保涵蓋自我、自他以及環境等不同層面，係對人世間的全面關懷。不過，環境是人類於現世存活的基礎，有其根本的重要

性，在人類影響環境日益劇烈的「人類世」(Anthropocene) (Lewis & Maslin, 2015; Olsson et al., 2017; Steffen et al., 2015)，諸般環境風險與威脅已迫使當代人類社會不得不正視之，聖嚴法師自不會無視此等關切，並直言「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是現代人的三大問題之一（聖嚴法師，2011：29）。要之，環境關懷是心靈環保的重要面向，為追尋「真正的平安」所不可或缺者（聖嚴法師等，2001：46）。倘若我們將目光聚焦在「環境」面向，心靈環保代表的是何種環境論述與主張？對此，我們可以從人與自然的關係、環境問題的成因以及解決環境問題之道三個層次，來予以掌握。

（一）人與自然的關係：自然是人類共有的一個大身體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環境倫理的核心關懷。大抵上，自然指的是「地球的整體大環境，包括生物與非生物的資源和環境」（聖嚴法師，2015：36）。這樣的地球大環境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大環境，我們的身體就無法存在」（聖嚴法師，2004a：68）。也就是說，自然環境扮演著生命支持系統的角色，人類的生存繫於自然界眾多生物與非生物之間的互依關係，對其他物種或生態系的傷害，無異於損害人類生存的基礎。人類是大自然這個超大生命共體的成員之一，而非置身於外，遑論超越其上（楊冠政，2002；Leopold, 2015），有別於西方啟蒙運動以降蔚為主流的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想法（Merchant, 1990）。正因如此，聖嚴法師將人與自然比喻為母親照護子女關係，強調人類應心存感恩，如同他在〈大地觀〉中說道：

大地，猶如我們的『母親』。我們要體會大地的功德和恩惠，以及大地對我們的影響和功能……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大地上，沒有大地，我們就無法存在。因此，大地是我們最大的恩人……只要體會到大地的精神、大地的恩德、大地的功能，我們就能體驗到佛菩

薩的心，因為『佛菩薩的心與大地的心是相同的』，只有奉獻、付出，不會要求回饋。（聖嚴法師，2020a：15-17）

換言之，自然環境作為人類與其他萬物眾生的共同居所，更提供人類生存所需的種種資源，我們應該感恩大自然的惠益，正視「沒有獨立於剝土之外的眾生，也沒有獨立於眾生之外的剝土」的「身土不二」智慧（游祥洲，2012；楊惠南，2005：182），體認人類和自然的「一體觀」洞見（聖嚴法師，2004b：67）。

除了自然是「人類共有的一個大身體」之整體論觀點外（聖嚴法師，2015：37），聖嚴法師於2000年「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環保小組討論會，更以佛菩薩闡釋自然環境：「《華嚴經》中的一切山水草木，都是『大菩薩的化現』，因此相信一切生物無生物都是『佛的法身』，不僅黃花翠竹皆說佛法，石間的頑石，也能領會佛法」（聖嚴法師，2000：50），並透過佛教徒對佛的尊崇，試圖讓彼等認識另外一個層次的人與自然關係。例如：所有的「動物」都可能是現在的菩薩、未來的佛；「森林」等於是未來佛居住的世界；釋迦牟尼佛在「河邊」成佛，在「林下」說法與修行（聖嚴法師，2004a：68-70）。綜之，聖嚴法師一方面闡明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從而與之有著工具價值的關係，他方面藉由佛教徒對於佛菩薩的信仰，透過佛菩薩與森林、水、動植物等自然的構成元素之間的關係，嘗試建立人與自然（即佛的現世化身）間的非物質關係或關係價值，進而激起珍愛與保護自然環境之心。

（二）環境問題的成因：心靈貧窮

水資源耗竭與污染、土壤流失與劣化、漁業資源枯竭、核能風險、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流失、沙漠化、森林面積退縮、化石燃料危及空氣污染等諸多環境問題，早已是現代人所熟知的永續挑戰。儘管環境問

題的外顯形態多樣，但皆以某種讓我們不快樂的情境或生物物理現象被人類所經驗，意味著某種損失。然而，這樣的理解帶有誤導性，以為是「環境」出了問題；究其根本，問題的成因或驅力事實上是來自人類社會，亦即，由「社會制度、文化信念及個體人格特質」交互作用而成（Brulle, 2000: 20）。對於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之論，聖嚴法師有著類似的主張：

「心靈環保」的意思是指對環境衛生的保護，以及人類生存空間的維護。為什麼要講「心靈環保」呢？因為環境的污染是由人造成的，「環境」本身不會製造任何污染……物質環境的污染不離人為，而人為又離不開人的「心靈」。如果人們的「心靈」清潔，則我們的物質環境不會受到污染。（聖嚴法師，2016：98）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心靈是指導身體的，我們的行為是和心連在一起的」，由於「我們的心被污染了，以至於環境也被污染」，法師甚至有「人心是最大污染源」之說，因此力推心靈環保，強調改變心念與價值觀之於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聖嚴法師，2004a：48，39）。

心污染與境污染的連動細節為何？聖嚴法師（2001：65）明確指出，環境問題是「自私的人心」所造成。根據Koslowski（2001: 1）之見，人類的行為動機可區分為「最強」與「最好」（the strongest and the best of human motives）兩大類，前者是主流經濟學所根基的自利，後者則為倫理學的關懷重點，也就是對善、責任與美德的追尋。當前的社會文化趨向於「最強的動機」卻疏離「最好的動機」，在以理性經濟人極大化個人利益為尚的社會氛圍中，制度規範與個人特質往往也都呈顯崇尚競爭與私利的價值觀，包含環境問題在內的許許多多社會發展之負面後果乃衍生而出。法師進而將只重提昇「物質生活品質」而忽略「精神生活品質」的自私心稱為「心靈貧窮」（聖嚴法師，2002：126，2005c：78），提醒關心環保的世人應予注意，因為心靈貧窮者只

為一己私利，

他們可能會破壞自然地球環境，也可能會破壞社會環境秩序，製造人與人的對立、族群與族群的衝突，乃至發動大小毀滅性的戰爭，這都是由於他們的「貪欲」，永遠無法得到滿足的緣故。（聖嚴法師，2005c：78）

這種「希望自己能夠得到的多、享受的好，貪圖眼前的利益」的貪慾之心，只見個人私利，既無視於「地球上的其他眾生也有求生存的權利」，也無知於「應該多留一些自然資源給我們的後代子孫」（聖嚴法師，2004b：67），一味地追求眼前的「財富與便利」，形成「人與人爭」、「人與自然爭」（聖嚴法師，2000：51）以及「過度消費」或浪費（Bauman, 2018）的生活模式，導致自然資源枯竭、生態破壞和巨大的環境壓力。但是對物質富裕與便利性的不饜足追求，一方面不能無止境地轉化成生活福祉與幸福感之提昇，他方面卻可能會超越地球承載力的環境高限而造成環境危害。面對「欲壑難填」而地球承載力有限的現實（聖嚴法師，2001：63），可行之道在於轉向精神境界的追尋，將對自然無限度索求的力量部分疏導於精神層面，紓緩衝擊著生命支持系統的物慾洪流。

（三）解決環境問題之道：四種環保

心靈環保是成就人間淨土的方法，人間淨土是心靈環保的現世社會理想，人間淨土若從永續性的角度觀之，可以詮釋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宜居之地，也就是人類得以與眾生萬物長久共同生存的大環境。此種和諧之境的創建途徑在於：

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不是要把信仰中的十方佛國淨土，搬到地球上來……而是用佛法的觀念，來淨化人心，用「佛教徒的生活

芳範」淨化社會，通過思想的淨化、生活的淨化、心靈的淨化，以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的逐步努力，來完成社會環境的淨化和自然環境的淨化。（聖嚴法師，20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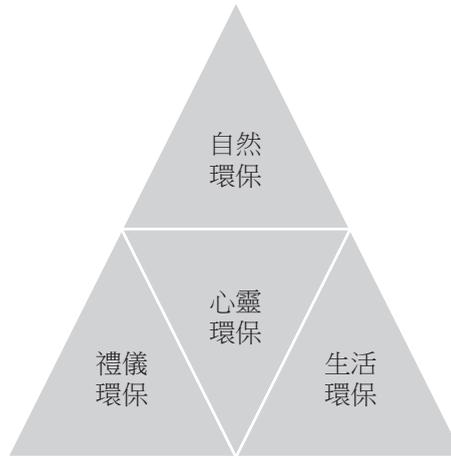
由此可見，人間淨土不同於他方佛國淨土，指的是「生活環境中沒有物質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人為的污染，以及自然環境的污染」（聖嚴法師，2020a：173），而去除種種污染的關鍵就是「佛教徒的生活芳範」，也就是實踐以「心靈環保」為核心的「四種環保」（詳圖2）。四種環保涵蓋自然、生活、禮儀與心靈等四個層面，是聖嚴法師根據佛法中的「五蘊、有情界和器世間」¹⁰等觀念所提出（聖嚴法師，2011：18），其內涵略為：

一、自然資源的愛惜及生態環境的保護。二、家庭生活的整潔及日常用品的簡樸。三、人際禮儀的提昇及社會禮俗的改良。四、不以一人一族及一時一地的立場做考量，當以全時空的全人類，都受到生存的保護，都擁有生活的權利，都感到生命的尊嚴，做為考量的立場。（聖嚴法師，2000：52）

不管是日常生活的行為舉措、人際往來的社交儀式活動，乃至於與自然生態環境的任何互動，皆有其環境向度，舉凡日常食衣住行的選擇、婚祭儀典不鋪張浪費、勤耕山海以及土地開發等，無一不是體現友善環境行動的機會。至於以環境公益為念而投入環境改革工作，「使自己的心隨時都能安定」（聖嚴法師，2020a：181），為持續努力整備心力，其價值作用尤其關鍵。整體而言，四種環保涵蓋了從物質面的環境保護到精神性的環保意識與修養，各自有其防守範圍。申言之，心靈環

¹⁰ 按聖嚴法師（2011：18）的說法，五蘊實際上就是身心；有情界係指有情世界，即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器世間則為我所處的大環境，可以理解為自然環境。

圖2
四種環保概念



保觀照的是保護自己的心靈不受污染或精神思想的淨化，屬自我層次；禮儀環保則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強調以真誠、謙卑和禮貌與人相處，屬自他層面；生活環保講求節儉、整潔和簡樸的生活模式，屬個人層次的自然資源維護；自然環保則擴及人地關係的反思，屬結構層次的自然環境保育。申言之，心靈環保旨在建立「少欲知足、關懷他人」的「正確人生價值觀」（聖嚴法師，2004a：59，2005a：55），將個人的貪慾引向知福惜福，為其他生命奉獻的道路，使慾望昇華，「用奉獻取代掠奪，以慈悲心公平對待世界眾生」（邱麗文，2002：33）。也就是透過此種轉化，讓人擁有充分的安定感及安全感，對內心、外境都沒有矛盾衝突，形成慈悲大地的環保觀，從而引發與支持其他三種環保。要之，四種環保共同構成一種「全面性的環保運動」（聖嚴法師，2000：52）。

四位一體的四種環保對於邁向永續社會轉型具有重要的啟示性。Sponberg（1997：353）將佛法教示區分為關係（relational）與發展（developmental）兩個相輔相成的基本層面，前者表達「一切事物皆相

互關聯」的觀念，後者說明「轉化愚癡與苦痛為覺悟與解脫」之功能。發展面向著重於「精神成長與發展」或「意識的演化性轉變」，而精神發展或意識轉化意味著「更高的倫理感受力」，並表現為對於「一切存在的慈悲」（Sponberg, 1997: 353, 363），故而能夠造福自身與一切生命。這種轉化的力量，來自佛教教義提供的系統化修行，透過這套方法，從中領會並實踐一切存在的根本相互關聯，進而對被領會到的關聯性產生深刻的倫理責任感（ethical sense of responsibility），並以慈悲利世或利益眾生的（環境）行為展現於外（Sponberg, 1997: 366）。四種環保因此可謂是整合了佛法「發展面向」與「關係面向」的當代應用，從心靈改革或淨化入手，強調日常生活的實踐，以期將過去錯誤的「人類中心主義」認知，革新為「自我覺悟」的「生態大我」（楊惠南，2005：xii），發揮「慈悲的轉化力量」（Sponberg, 1997: 368），把世上分歧的利益匯歸於「全地球、全人類永續的共同性利益」（聖嚴法師，2005a：61）。

最後，法鼓山以教育機構自我定位（聖嚴法師，2019b：102），四種環保所含括的思維、生活方式、與人相處的態度，以及對待大地環境之道（高煜玟，2007），既是踐行環保工作的四個具體途徑，也是澄清環保觀念的四個「教育」面向，同時推廣理念與作法，不把教育當成一種靜態的智識活動，更是奠基於日常生活的實踐渠道，達到對「實際人生滲透指導」之作用（林其賢，2010：173）。綜之，環境保護須得「深入到社會及觀念等的精神層面」而不能僅止於物質層面，也就是必須和個人的「宗教信仰及哲學思想結合成為一種使命性的任務」（聖嚴法師，2000：52）。實務上，這也是推廣環境教育和環境倫理的著眼點所在（林美香，2013；楊冠政，2002）。唯有如此，環境保護才不會淪為政策口號，永續發展或人間淨土的終極任務也才有成就的可能。

五、心靈環保與永續實踐之親和

修慈悲利他菩薩道者，固然「理想崇高」，惟其「行踐要從平實處做起」（印順法師，1989：66）。因此，聖嚴法師教示「心靈環保的著手工作，是從待人接物，日常生活的起心動念處，隨時做起」（邱麗文，2002：33），要把人間淨土思想推廣成為「人人都能實踐的一種生活方式」（聖嚴法師，2003：6）。作為建設人間淨土總綱的心靈環保，係本於「生活，就是修行」之理念所擊劃的教育施設（聖嚴法師，2020a：182），由此開展出的四環、心五四及心六倫等運動，在在強調知行合一，需於日常生活中予以「實踐」（林其賢，2010：175-183；胡健財，2014：291；辜琮瑜，2022：76）。質言之，心靈環保是一種「生活的態度」（胡健財，2014：294）或「新倫理生活方案」（林其賢，2010：175），引領世人如何在人生正道中行為，逐步達到導民化世的作用。以環境論，心靈環保意在培養一種環保或清淨的生活態度與生活方式，例如，自願簡樸（voluntary simplicity）（Elgin, 2008）或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Schumacher, 2000）。此種著眼於日常生活的實踐路線，係心靈環保運動對佛教之「轉化」作用的深刻認識與展現。

以當代糧農為例，現代農業（或言石油農業）以石油、科學（特別是化學）與慣行農耕技術（含高產量品種）為基礎，且相關的組織與制度圍繞著其需求而設，再搭配上「大量生產—消費—廢棄」的行為模式，共同構成近代農糧體制（枋瀉俊子等，2016；郭華仁，2012；Lang & Heasman, 2004; Thompson, 2015）。該體制雖造成土壤流失與污染、資源短缺、生物多樣性降低、氣候變遷等環境問題（Montgomery, 2007, 2017），並對多元飲食文化與小農經營模式帶來重大衝擊（van der Ploeg, 2008）；但在食與農斷裂以及農業工業化的社會歷史脈絡中，該發展模式之「不永續」問題未受正視卻得以維持其主流地位。然

而，在低碳飲食、食物正義、食物主權、慢食運動等當代另類農食訴求風潮中，有機與友善農業（陳玠廷、王慧瑜，2016；蔡晏霖，2016；顏愛靜等，2016）、新型態市場模式（莊雅仲、陳淑容，2016；萬尹亮，2021；Hebinck et al., 2015; Milone et al., 2015）、家庭農場或小農再興（陳玠廷，2018；Hebinck, 2018; Oostindie, 2018; van der Ploeg, 2018），以及食農教育（張瑋琦，2019；葉秀燕，2020；葉欣誠等，2019；鍾怡婷，2018）等發展趨勢，正逐漸形成對抗工業化農業生產及世界糧食體系之另類農食網絡與文化。就轉型三重圈以觀，另類農食網絡雖含括眾多社會創新，若要擴增規模，達到質量俱變的系統變遷，便得由實作圈的個別創新層次進階至政治圈變革，並關注個人圈的「價值、信念與典範」，透過改變社會文化規範以觸發大規模的轉型。

社會文化規範代表著一種普遍的行為模式（*predominant behavioral pattern*），被社群內的成員所共同認可，並在長期的社會互動與反饋過程中被強化而穩固，循同樣的系統反饋機制，該等規範因此也是翻轉不永續農糧體制的社會轉捩點（*social tipping points*）所在（Nyborg et al., 2016: 42）。具體而言，我們需要不同於強調交換價值之「商品食物」的替代性文化價值觀點，體認食物是和地方生態及文化環境高度相關的「生存必需品」，而非單純的「市場商品」，重新檢視追求「價格低產量高」的發展目標預設，反思「愈多 = 愈好」的價值偏好。這樣的文化省思與價值觀點之影響程度與範圍，須得廣泛深刻到足以形成親永續性的文化或生活方式，從而發揮系統層級的干預介入措施（*systems-level intervention*）的作用，以對治系統性不永續（*systemic unsustainability*）問題（Little et al., 2019）。簡言之，諸般農食運動及其社會創新要能夠匯聚成「新生活態度」或「新倫理生活方案」，才有翻轉的實踐動能，突破農糧體制的轉型困境。

心靈環保強調「從人心的淨化做起」，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便是著眼於改變社會文化規範及其引導的行為模式，期能引導世

人「尊重生命、珍惜資源」，為「眾生的利益、眾生的苦難」行慈悲救濟之事（聖嚴法師，2005a：57）。整體而言，本於佛法的心靈環保，其蘊含的轉化力量，讓人得以覺察自身，反思何謂有意義的人生、值得過的日子，有益於形成反省「競爭逐利，唯成長是尚」之主流價值觀的替代性文化框架，代表了一種「對文化改變的正面力量」（林其賢，2010：203），類同於前述的個人圈之永續性干預措施。在「少欲知足、關懷他人」的人生價值觀引導下（聖嚴法師，2004a：59），便易於展開環保或清淨的生活態度與生活方式，對於「大量生產—消費—廢棄」社會典範驅動的工業資本主義農糧體制，及其造成的農業與環境問題也較有意願挺身作為。例如，對小農、農夫市集、友善環境產品的支持，而不囿限於價格取向，為農事操作與市場行銷的轉型性變遷創造有利條件。質言之，心靈環保其實是在集體層次創造「替代性價值觀、社會生活風格與反身性實踐」（Loorbach et al., 2017: 608），形塑共享的未來方向以及引導性價值觀，邁向平衡永續豐美的社會。

六、代結論：心靈環保開啟永續躍遷的機會之窗

永續發展被定義為「滿足當代需要而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能力」的「發展」，意指某種特定類型的發展，但何謂「發展」？發展是一個複雜多義而具爭議性的概念，難以為之提供單一的定義界說，¹¹ 在眾多紛雜的發展概念中可以發現一個共通主題：各種不同視角下人類社會（處境）之「持續改變」（Sumner & Tribe, 2008: 11）。之所以如此

¹¹ 例如，以成長（growth）為導向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與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對抗主流的另類發展（alternative development）、以人為本（human-centred）的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乃至於加入環境思考的永續發展，不一而足（Pieterse, 2010）。

乃是因為，人類所處之政經社文及自然等各種環境長期而言都在變動。環境危機因此不應理解為發展的副作用，而是社會組織及文化價值無法與自然環境條件彼此調適所致。例如，Norgaard（1994）便主張永續發展是「價值、組織、技術、知識與環境」之間相互選擇、彼此調適的結果，問題的發生意味著彼此調適的整體性受到破壞。就「社會—生態系統」以觀，生態環境是生命支持系統，永續發展必然包含維繫地球的生態完整性，要求人類社會在地球承载力範圍內運作，惟其成就與否須視經濟與社會系統是否支持長期穩健的環境治理，此等擁抱永續性價值的體制正是當代人類社會所缺乏者。然而，上述永續發展定義只是對某種可欲狀態的粗略描述，存在著有願景無策略之「實踐赤字」問題；相對地，永續躍遷則以如何促成轉型為旨趣，將焦點錨定在翻轉現行不永續的體制，亦即「體制遞移」。

體制遞移係多重深層結構轉型，涉及「世界觀、制度與科技」的整體系統性（an integrated system）變革，並非個別科技物或創新實作可盡其功（Beddoe et al., 2009: 2484）。體制是一個複雜系統，其存立以慣性維持為常態。例如，農糧體制就是因為科技、政策、市場、產業、文化等系統組構元素彼此鎖定而呈穩固之況。依永續躍遷研究之轉型三重圈架構可知，個人圈觀照的「信念、價值、世界觀與典範」，形塑著社會文化規範，為翻轉現行不永續之「社會—生態系統」的系統槓桿點。這樣的主觀文化構成，賦予事物價值意義，界定何謂美好生活，中介問題如何被詮釋，以及引導人們的行動方向。職是之故，任何對於較永續的生活方式或永續躍遷之探尋，皆須關注複雜的社會文化因素，因為該等因素形塑著日常生活慣行背後的敘事（Paddock, 2017），從而成為穩定體制的根本力量。申言之，發展的具體內涵其實是在不同的文化脈絡底下建構而成，文化之於發展起著深刻的作用（Harrison & Huntington, 2000）。例如，以發展型國家為特性的臺灣，在經濟成長的發展總目標下，追求「便捷快速」的交通運輸體制，滿足持續攀升

能源需求而能「供應無虞」的能源體制，戮力於「價低量高」的農糧體制，乃附麗共生，共同反映著「愈大、愈多、愈快 = 愈好」的價值偏好，如不能對此有所質疑與反省，不永續的發展方向將難以翻轉。

從永續躍遷研究而論，體制遞移是邁向永續所不可或缺者，而與社會實踐密不可分的文化價值觀有其根本的重要性。儘管科技與制度目前在政策與研究上受到較多的重視，但文化價值觀左右著人們對不永續性問題的理解，乃至於對前二者之永續替代方案的接受與否。對此，聖嚴法師倡議推動的「心靈環保」，強調「從人心的淨化做起」，改變個人的心念與價值觀，由內而外，以迄於外在物質環境的保護。此種「全面性的環保運動」，為親永續的「新倫理生活方案」提供實際踐行的指引與作法，發揮寓環境倫理責任感於日常生活實踐的作用。亦即，在「少欲知足、關懷他人」的人生價值觀引導下，透過「生活簡樸」的日常實踐，內化環境倫理，為建構某種永續文化或社會氛圍逐步奠下社會基礎，不僅可以引導創新的方向，並能以此文化觀點中介環境變化或壓力之詮釋，形塑應對之道，甚且挑戰體制之合宜與正當性，進而開啟轉型的機會之窗。心靈環保就像是一種「生活型的環境教育」，轉化著整體社會的文化價值觀，進程雖然緩慢，隨著持續地推廣與力行，所帶來的改變卻是不易逆轉，不似一般政策多有政隨人移之弊，具有「深層槓桿點」的作用。

循此反思永續發展，以「成長」解決永續挑戰的傳統主流思路是不可行的，應深刻理解發展的驅力不是無限成長的迷思，而是「改變舊世界，想像新世界的力量」（Crush, 1995: 2）。將發展重新理解為「集體學習」（collective learning）的過程，藉此方能持續突破過往實踐所設下物質性與觀念性限制（Pieterse, 2010: 182）。亦即，從量增的成長思維，遞移至質變的發展觀念，調和無限成長的慾望與有限的地球承载力之間的矛盾，轉化在「成長積累」視角下被評為不可行、不可欲的替代方案，為邁向平衡永續豐美社會與未來的必要創新選項。須得認識到，

永續躍遷雖是目的性的作為，惟不同社會群體之利益與行動的聚合及協同一致卻是轉型過程的結果（Geels & Schot, 2007: 402），心靈環保寓環境倫理責任感於日常生活實踐的轉化力量，便係貢獻於匯歸歧見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永續願景，讓永續價值得以超越言語上的流行性而能夠在思想與實踐上主流化。而心靈環保運動就是永續型「新倫理生活方案」之「集體學習」的渠道與體現。

引用文獻

- 印順法師（1989）。《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臺北：正聞。
- 朱建民（2007）。〈傳統宗教對當代環境議題的回應：以西方的基督教和臺灣的佛教為例〉，劉阿榮等（著），《應用倫理學的新面向》，43-64，新北：揚智。
- 江靜儀（2018）。〈永續發展與建設淨土——全球倫理架構〉，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聖嚴研究（第十輯）》，369-422，臺北：法鼓文化。
- 何明修（2006）。《綠色民主：臺灣環境運動的研究》，臺北：群學。
- 何明修、蕭新煌（2006）。《臺灣全志卷九 社會志 社會運動篇》，南投：臺灣文獻館。
- 果東法師（2010）。〈序一〉，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聖嚴研究》第一輯》，3-5，臺北：法鼓文化。
- 林其賢（2010）。〈聖嚴法師人間淨土思想的實踐與弘揚〉，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聖嚴研究》第一輯》，153-205，臺北：法鼓文化。
- （2011）。〈聖嚴法師人間淨土思想立場的抉擇〉，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聖嚴研究》第二輯》，155-200，臺北：法鼓文化。
- 林美香（2013）。〈環境教育中幾個值得探究的思想與哲學問題〉，《鵝湖學誌》，50：153-201。
- 林益仁（2004）。〈環境實踐的「全球」與「在地」辯證：以法鼓山的「環保」論述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5：1-46。
- 林朝成（2005）。〈佛教走向土地倫理——「人間淨土」的省思〉，《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5：59-90。
- 法鼓文化編輯部（2012）。〈編輯序：帶著好心，開創好世界〉，聖嚴法師（著），《好心 好世界：聖嚴法師談心靈環保》，2-7，臺北：法鼓文化。
- 邱麗文（2002）。〈推動「心靈環保」的宗教家——聖嚴法師〉，《新觀念》，174：26-33。

- 紀俊吉（2014）。〈釋聖嚴環境思想與其教育意涵芻議〉，《北商學報》，25/26：77-99。
- 胡健財（2014）。〈聖嚴法師創建法鼓山之時代意義——以「四個環保」思想為對象之研究〉，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聖嚴研究》第五輯》，269-320，臺北：法鼓文化。
- 高煜玟（2007）。〈關心地球暖化 師父和探險家戴維斯對談〉，《法鼓雜誌》，209，<http://www.ddm.org.tw/maze/209/page1.asp>
- 張國暉（2019）。〈從政府治理到轉型研究及風險治理：來自系統、科技與頑強問題的新刺激〉，《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7，3：233-285。
- 張瑋琦（2019）。〈臺灣食農教育內涵翻轉形式——生產體驗之外，形塑在地飲食文化〉，《豐年雜誌》，69，3：22-28。
- 梁容（2014）。〈臺灣人間佛教的生態實踐的社會處境及社會意義：論慈濟與法鼓山心靈環保進路〉，學愚（編），《生態環保與心靈環保：以佛教為中心》，152-180，上海：上海古籍。
- 莊雅仲、陳淑容（2016）。〈中型城市發展與城鄉新連結〉，《文化研究》，22：123-146。
- 郭華仁（2012）。〈有機農業的必然與實現——典範移轉與立法〉，《台灣國際法季刊》，9，4：81-111。
- 陳玠廷（2018）。〈「再小農化」的有機實踐：以官田水雉綠色保育計畫為例〉，《臺灣鄉村研究》，13：57-93。
- 陳玠廷、王慧瑜（2016）。〈有機3.0的倡議與實踐：兼談臺灣有機農業立法〉，《農業推廣文彙》，61：145-156。
- 惠敏法師（1998）。〈「心淨則佛土淨」之考察〉，惠敏法師（主編），《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221-246，臺北：法鼓文化。
- 游祥洲（2012）。〈論「身土不二」與深層生態倫理學的建構並探索其多元應用面向——從「不二法門」的觀點切入〉，《新世紀宗教研究》，10，3：1-39。
- 程進發（2014）。〈聖嚴法師的環境哲學思想〉，聖嚴教育基金會學術研究部（編），《《聖嚴研究》第五輯》，343-375，臺北：法鼓文化。

- 辜琮瑜（2022）。《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學意義與開展》，臺北：法鼓文化。
- 黃信勳、徐世榮（2014）。〈戰後臺灣的環境治理進路：一個生態現代化視角的考察〉，《思與言》，52，4：5-63。
- 楊冠政（2002）。〈環境倫理——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環境教育學刊》，創刊號，1-11。
- 楊惠南（1996）。〈從「境解脫」到「心解脫」：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態學〉，傳道法師（編），《佛教與社會關懷學術研討會：生命、生態、環境關懷論文集》，193-206，臺南：佛教文獻基金會。
- （2005）。《愛與信仰》，臺北：商周。
- 萬尹亮（2021）。〈從實作觀點看另類食物網絡如何形構永續生活〉，《文化研究》，32：211-254。
- 聖嚴法師（1999）。《法鼓山的方向》，臺北：法鼓文化。
- （2000）。〈環境保護〉，《人生雜誌》，206：50-52。
- （2001）。〈菱花有佛喻〉，《自家寶藏——如來藏經語體譯釋》，59-73，臺北：法鼓文化。
- （2002）。〈禪的心靈環保〉，《禪的世界》，125-135，臺北：法鼓文化。
- （2003）。《淨土在人間》，臺北：法鼓文化。
- （2004a）。《聖嚴法師心靈環保》（二版），臺北：法鼓文化。
- （2004b）。《人間世》，臺北：法鼓文化。
- （2005a）。〈從東亞思想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學術論考II》，41-61，臺北：法鼓文化。
- （2005b）。〈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學術論考》，臺北：法鼓文化。
- （2005c）。《致詞》，臺北：法鼓文化。
- （2011）。《我願無窮——美好的晚年開示集》，臺北：法鼓文化。
- （2015）。《法鼓山的新時代倫理觀：心六倫》（二版），臺北：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
- （2016）。〈心靈環保〉，《禪門》（三版），98-111，臺北：法鼓文化。

- （2018）。〈人生佛教到人間淨土〉，《法鼓山的方向：理念》，132-134，臺北：法鼓文化。
- （2019a）。〈傳薪創新 感恩發願〉，《法鼓山的方向：弘化》，116-124，臺北：法鼓文化。
- （2019b）。〈薪火相傳推動教育〉，《法鼓山的方向：萬行菩薩》，101-106，臺北：法鼓文化。
- （2020a）。《禪的理論與實踐》，臺北：法鼓文化。
- （2020b）。〈以研究「聖嚴」來推動淨化世界〉，2022.4.18，<http://ddc.shengyen.org/?doc=03-07-052>
- 聖嚴法師等（2001）。〈平安的追尋〉，《聖嚴法師與人文對話》，44-75，臺北：法鼓文化。
- 葉秀燕（2020）。〈原食力：原住民飲食文化做為食農教育的社會實踐〉，《思與言》，58，3：167-212。
- 葉欣誠、于蕙清、邱士捷等（2019）。〈永續發展教育脈絡下我國食農教育之架構與核心議題分析〉，《環境教育研究》，15，1：87-140。
- 趙敬邦（2011）。〈從應用角度探討佛教「中道」思想對環境倫理的啟示〉，《應用倫理評論》，51：1-18。
- 蔡晏霖（2016）。〈農藝復興：臺灣農業新浪潮〉，《文化研究》，22：23-74。
- 蕭貞貞（2011）。〈從原始佛教的宇宙觀談現代的環保〉，《新世紀宗教研究》，10，1：133-155。
- 鍾怡婷（2018）。〈永續轉型觀點下的食農教育：以二個學童種稻體驗活動為例〉，《臺灣鄉村研究》，13：35-55。
- 顏愛靜、陳胤安、吳宜庭（2016）。〈有機農業多功能性之探究：以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為例〉，《臺灣土地研究》，19，1：69-103。
- 梶瀉俊子、谷口吉光、立川雅司等（編著）（2016）。《食農社會學：從生命與地方的角度出發》，蕭志強等（譯），臺北：開學文化。
- Bauman, Z.（2018）。《廢棄社會》，谷蕾、胡欣（譯），臺北：麥田。
- Elgin, D.（2008）。《簡樸》，張至璋（譯），新北：立緒。
- Leopold, A.（2015）。〈土地倫理〉，《沙郡年紀：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

- 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李靜滢（譯），253-277，臺北：果力文化。
- Meadows, D. (2016)。《系統思考：克服盲點、面對複雜性、見樹又見林的整體思考》，邱昭良（譯），臺北：經濟新潮社。
- Schumacher, E. F. (2000)。《小即是美：一本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著作》，李華夏（譯），新北：立緒文化。
- Abson, D. J., Fischer, J., Leventon, J. et al. (2017). “Leverage Points for Sustainability Transformation,” *Ambio*, 46: 30-39, <http://doi.org/10.1007/s13280-016-0800-y>
- Agyeman, J., Bullard, R., & Evans, B. (Eds.). (2003). *Just Sustainabilities: Development in an Unequal World*, London: Earthscan.
- Avelino, F., Grin, J., Pel, B. et al. (2016).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18, 5: 557-567, <https://doi.org/10.1080/1523908X>
- Beddoe, R., Costanza, R., Farley, J. et al. (2009). “Overcoming Systemic Roadblocks to Sustainability: The Evolutionary Redesign of Worldviews,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ies,” *PNAS*, 106, 8: 2483-2489, <https://doi.org/10.1073/pnas.0812570106>
- Brauch, H. G., Spring, U. O., Grin, J. et al. (Eds.). (2016). *Handbook o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and Sustainable Peace*, Switzerland: Springer.
- Bruckmeier, K. (2016).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Reconnecting Society and Nature*, London: Macmillan.
- Brulle, R. J. (2000). *Agency, Democracy and Natu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Chan, K. M. A., Balvanera, P., Benessaiah, K. et al. (2016). “Opinion: Why Protect Nature? Rethinking Values and the Enviro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 6: 1462-1465, <https://doi.org/10.1073/pnas.1525002113>
- Christmann, G. B., Balgar, K., & Mahlkow, N. (2014). “Local Constructions of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A Comparison of Lübeck and Rostock,” *Social Sciences*, 3, 1: 142-159, <https://doi.org/10.3390/socsci3010142>

- Crush, J. (1995). "Introduction: Imagining development," J. Crush (Ed.), *Power of Development*, 1-21, New York: Routledge.
-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18). *Perspectives on Transitions to Sustainability*,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 Fischer, J., Manning, A. D., Steffen, W. et al. (2007). "Mind the Sustainability Gap,"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2, 12: 621-624, <https://doi.org/10.1016/j.tree.2007.08.016>
- Fischer, J., & Riechers, M. (2019). "A leverage Points Perspective on Sustainability," *People and Nature*, 1, 1: 115-120, <https://doi.org/10.1002/pan3.13>
- Geels, F. W. (2018). "Disruption and Low-Carbon System Transformation: Progress and New Challenges in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s Research and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37: 224-231, <https://doi.org/10.1016/j.erss.2017.10.010>
- Geels, F. W., & Schot, J. (2007). "Typology of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Pathways," *Research Policy*, 36, 3: 399-417,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07.01.003>
- Geels, F. W., Sovacool, B. K., Schwanen, T. et al. (2017).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s for Deep Decarbonization," *Science*, 357, 6357: 1242-124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o3760>
- Gliedt, T., & Larson, K. (2018). *Sustainability in Transition: Principles for Developing Solu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Grin, J. (2016). "Transition Studies: Basic Ideas and Analytical Approaches," H. G. Brauch, Ú. O. Spring, J. Grin et al. (Eds.), *Handbook o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and Sustainable Peace*, 105-122, Switzerland: Springer.
- Grin, J., Rotmans, J., & Schot, J. (2010). *Transition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ong Term Transformative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 Hackmann, H., & St. Clair, A. L. (2012). *Transformative Cornerston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 Global Change*, Paris: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 Harrison, L. E., & Huntington, S. P. (Eds.). (2000).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 Hebinck, P. (2018). “De-/re-agrarianis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1: 227-235,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8.04>
- Hebinck, P., Schneider, S., & van der Ploeg, J. D. (Eds.). (2015).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arkets*, New York: Routledge.
- Huntington, S. P. (2000). “Cultures Count,” L. E. Harrison and S. P.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xiii-xvi, New York: Basic Books.
- Kemp, R., Schot, J., & Hoogma, R. (1998). “Regime Shifts to Sustainability Through Processes of Niche Formation: The Approach of 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10, 2: 175-198, <https://doi.org/10.1080/09537329808524310>
- Köhler, J., Geels, F. W., Kern, F. et al. (2019). “An agenda for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Research: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Direction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31: 1-32, <http://doi.org/10.1016/j.eist.2019.01.004>
- Koslowski, P. (2001). *Principles of Ethical Economy*, Dordrecht: Springer.
- Lachman, D. A. (2013). “A survey and Review of Approaches to Study Transitions,” *Energy Policy*, 58: 269-276, <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3.03.013>
- Lang, T., & Heasman, M. (2004). *Food Wars: The Global Battle for Mouths, Minds, and Markets*, Sterling: Earthscan.
- Lewis, S. L., & Maslin, M. A. (2015).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 *Nature*, 519, 7542: 171-180,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4258>
- Little, V., Lee, C., & Nair, S. R. (2019). “Macro-Demarketing: Unlocking Un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ystems,”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39, 2: 166-187, <https://doi.org/10.1177/0276146718823885>
- Loorbach, D., Frantzeskaki, N., & Avelino, F. (2017).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Research: Transform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for Societal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42: 599-62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nviron-102014-021340>

- Mattijssen, T. J. M., Ganzevoort, W., van den Born, R. J. G. et al. (2020). "Relational Values of Nature: Leverage Points for Nature Policy in Europe," *Ecosystems and People*, 16, 1: 402-410, <https://doi.org/10.1080/26395916.2020.1848926>
- Meadows, D. H. (1999). "Leverage Points: Places to Intervene in a System," 2022.2.27, <http://donellameadows.org/archives/leverage-points-places-to-intervene-in-a-system/>
- Merchant, C. (199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Milone, P., Ventura, F., & Ye, J. (Eds.). (2015). *Construc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Rural Development*, Bingley: Emerald Group.
- Montgomery, D. R. (2007). *Dirt: The Erosion of Civiliz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17). *Growing a Revolution: Bringing Our Soil Back to Lif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Norgaard, R. B. (1994). *Development Betrayed: The End of Progress and a Co-Evolutionary Revisioning of the Fu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Nyborg, K., Anderies, J. M., Dannenberg, A. et al. (2016). "Social norms as Solutions," *Science*, 354, 6308: 42-4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f8317>
- O'Brien, K., & Sygna, L. (2013.6.19-21).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The Three Spheres of Transformation*. Proceedings of Transformation in a Changing Climate, University of Oslo, Oslo, Norway.
- (2018). "Transformations 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Perspectives on Transitions to Sustainability*, 28-44,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5). "System Innovation: Synthesis Report," 2019.8.3, <https://archiwum.pte.pl/pliki/2/1/OECD%20System.pdf>
- Olsson, P., Moore, M.-L., Westley, F. R. et al. (2017). "The Concept of the Anthropocene as a Gamechanger: A New Context for Soci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s to Sustainability," *Ecology and Society*, 22, 2: 31, <https://doi.org/10.1890/1523-1739-2017-0100>

org/10.5751/ES-09310-220231

- Oostindie, H. (2018). “Unpacking Dutch Multifunctional Agrarian Pathways as Processes of Peasantisation and Agrarianis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1: 255-264,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7.12.006>
- Ostrom, E. (2009).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cience*, 325, 5939: 419-42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72133>
- Paddock, J. (2017).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Rethinking the Policy Problem Through Narratives Of Food Practice,”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17, 1: 122-139, <http://doi.org/10.1177/1469540515586869>
- Pascual, U., Balvanera, P., Diaz, S. et al. (2017). “Valuing 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 The IPBES Approach,”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6, 27: 7-16, <https://doi.org/10.1016/j.cosust.2016.12.006>
- Pieterse, J. N. (2010). *Development Theory: Deconstructions/Reconstructions* (2nd ed.), London: Sage.
- Raworth, K. (2012). *A Safe and Just Space For Humanity – Can We Live Within the Doughnut?*, Oxfam Discussion Papers, Oxfam.
- Reyers, B., Folke, C., Moore, M.-L. et al. (2018).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Insights for Navigating the Dynamics of the Anthropocene,”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43, 1: 267-289, <http://doi.org/10.1146/annurev-environ-110615-085349>
-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5,” 2022.3.26, <http://www.cbd.int/gbo5>
- Seghezze, L. (2009). “The Five Dimensions of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8, 4: 539-556, <https://doi.org/10.1080/09644010903063669>
- Sponberg, A. (1997). “Green Buddhism and the Hieracharchy of Compassion,” E. T. Mary and D. R. Williams (Eds.), *Buddh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harma and Deeds*, 351-37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ålhammar, S., & Thorén, H. (2019). “Three Perspectives on Relational Values of

- Nature,” *Sustainability Science*, 14: 1201-1212.
- Steffen, W., Richardson, K., Rockström, J. et al. (2015). “Planetary Boundari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on a Changing Planet,” *Science*, 347, 6223: 1259855, <http://doi.org/10.1126/science.1259855>
- Sumner, A., & Tribe, M. (2008).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Los Angeles: Sage.
- Thompson, P. B. (2015). *From Field to Fork: Food Ethics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Uehara, T., Hidaka, T., Matsuda, O. et al. (2019). “Satoumi: Re-connecting People to Nature for Sustainabl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Coastal Zones,” *People and Nature*, 1: 435-441, <https://doi.org/10.1002/pan3.10047>
- United Nations. (2012).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3.26, <http://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737074>
- (2015a).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5,” 2022.3.26,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news.shtml>
- (2015b).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3.26, <https://wedocs.unep.org/20.500.11822/9814>
- (n.d.). “Conferences: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2.5.1, <https://www.un.org/en/conferences/environment>
- van der Ploeg, J. D. (2008). *The New Peasantri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Earthscan.
- (2018). “From de-to Repeasant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Revisite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1: 236-243,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7.12.016>
- West, S., Haider, L. J., Stålhammar, S. et al. (2020). “A relational Turn f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 Relational Thinking, Leverage Points and Transformations,” *Ecosystems and People*, 16, 1: 304-325, <https://doi.org/10.1080/26395916.2020.1814417>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